

人民炮兵的创建与奠基(1949—1956)

贺怀锴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几年,人民炮兵成立了领导机关,确定了炮兵发展目标和方针,组建了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人民炮兵建军伊始,就奔赴朝鲜战场,与步兵、装甲兵和空军配合,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人民炮兵经过战火的洗礼,在战斗中获得了实战经验。炮兵是高技术含量的兵种,建国初期又是炮兵部队急速扩军的阶段,急需大量掌握火炮技术的官兵,人民炮兵通过创办炮兵学校和部队训练,为炮兵建设提供了人才的支撑。炮兵部队在建军初期向苏联学习和接收苏联装备援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辩证学习和自主发展的重要性,为以后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陈锡联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2)09-0178-13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2.09.021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的战争中,炮兵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兵种,在合成作战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军种向诸军种、单一兵种向诸兵种转变,人民炮兵在此时期内实现了快速发展,并为以后的炮兵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目前关于人民炮兵的研究侧重于陈锡联与炮兵的建设^①,但未对人民炮兵的领导机构与人事、炮兵发展目标和方针、炮兵部队建制、炮兵入朝作战、炮兵学校人才培养、炮兵部队训练,以及苏联援助与人民炮兵自主发展等问题展开系统的论证。本文依托资料汇编、报刊、回忆录等史料,拟对人民炮兵的创建与奠基做以深入、全面和系统的考证和论述。

一、炮兵的领导机关建制、发展方针与部队建设

解放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长期在农村中进行作战,条件落后,不可能强调炮、工兵和装甲部队的建设”,军队的“装备是很差的”^②,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以步枪为主,“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我们吃过没有炮的苦头”^③。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托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火炮,逐渐建设了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9批面上资助项目“人民海军的创建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1M690901);河南省高等学校暨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资助项目“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20CXTD02、2019CXTD003);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民国时期海军的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2-ZZJH-2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贺怀锴(1990—),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①目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炮兵建设的研究侧重于陈锡联与人民炮兵的建设,苏振兰《陈锡联上将和人民炮兵建设》,《党史天地》2009年第4期;张翼《上将陈锡联与人民炮兵建设》,《党史纵横》2009年第5期等,然未系统的对人民炮兵建设的机构、发展方针和目标、部队建设、人才培养等展开考证。

^②《增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1950年12月15日),陈毅著《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27页。

^③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炮兵部队。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由防御逐渐转为进攻,毛泽东指出,今后作战“主要是攻击敌军阵地,必须用大力加强炮兵”^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有了相当的发展。炮兵一经发展,我们就到了攻击大堡垒的时候了”,攻打石家庄、济南、天津、太原等,“都是由于炮很多,炮弹也充足”^②。在济南战役后,据被俘虏的国民政府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参谋长罗辛理讲到,“你们的炮弹象雨点一样直往下落,把我们指挥所完全打乱了。我们的炮在你们的炮火压制下,完全不能发挥作用”^③。在1948年末到1949年初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消灭了敌人主力,炮是起了主要作用的”^④。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国民党的防御体系“就显得渺小了”^⑤。为了尽快解放全中国,并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毛泽东要求各野战军必须“主要地是加强炮兵”^⑥。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已发展成为除步兵之外最强大的一支力量,这也为人民炮兵部队的成立和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领导机构成立与炮兵发展目标及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各军兵种领导机关成为一项重要且急迫的任务。1949年12月,中央军委致电四野,“军委即须建立炮兵司令部”,“拟调四野特纵副司令苏进任炮兵副司令”,四野复电“同意”^⑦。1950年3月初,苏进完成广东沿海勘察地形任务后,抵达北京。同月17日,中央军委任命苏进为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负责筹建炮兵领导机关。4月,中央军委任命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陈锡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⑧,陈锡联向刘伯承、邓小平表示,自己“没有统率一个兵种的经验,怕干不了”,刘、邓对其讲到,“革命需要,不会可以学”^⑨。因陈锡联尚需处理西南事务,暂未到任,炮兵副司令员苏进实际负责炮兵司令部的筹建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指示,“在组建过程中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要帮助和支持”,为贯彻聂荣臻的指示,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决定,“凡属军委炮兵的事要先办,然后再办华北炮司的事”,一定“作好为军委炮司的服务工作”^⑩,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为军委炮兵领导机关的创办做出了贡献。

1950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宣告成立,这是炮兵部队走上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轨道的重要标志。10月,陈锡联抵达北京,就任炮兵司令员,全面加强了炮兵司令部的领导。为尽快把领导机构建起来,1951年初,中央军委指示,“将4野炮兵机关的大部分人员调京”,在此基础上相继成立了炮兵政治部、干部管理部、后勤部和军械部等机构。1951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彭嘉庆为第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邱创成为第二副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贾陶为参谋长,苏进改兼军械部长,常树仁为后勤部部长^⑪。5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中共炮兵委员会,陈锡联、邱创成、苏进、贾陶等6人为委

①《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②④《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1950年7月1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44页,第744页。

③《解放济南战斗中我炮兵发挥无比威力》,《人民日报》,1948年10月21日。

⑤《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3页。

⑥《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74页。

⑦苏进《全军炮兵领导机构的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1950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图片》,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⑨⑩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370页,第374页。

⑩《关于组建军委炮兵机关的回忆》,白竞凡编《高存信将军1军事工作文集》,北京: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1997年版,第445-446页。

员,以陈锡联为书记^①。1951年11月,总后勤部军械部与炮兵军械部合并为中央军委军械部,陈锡联兼任部长,封永顺任副部长,负责全军装备的生产、调配和管理的工作。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组建之后,克服了种种困难,逐渐完善了内部机构,在短期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制定了炮兵建设规划、炮兵作战方案、炮兵机关和部队编制、学校教育方针和炮兵部队训练大纲等,这些工作的开展为炮兵的有序发展夯实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了建设强大炮兵的远大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抗美援朝作战和军队现代化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炮兵的建设是非常重视的”^②。1951年4月,毛泽东为炮兵学校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③,明确指出了要建设一支强大炮兵的长远目标。炮兵被斯大林誉为“战争之神”,朱德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炮兵“是人类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兵种”,“现代战争仍然要重视炮的作用”,建国初期,集中力量发展炮兵是“一个正确的选择”^④。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指出,新兵种的建设“首先就是炮兵”,现代化的特点“就是优越的火力,于是步兵不能没有炮兵协同动作”^⑤。朱德为人民炮兵题词,“建设人民炮兵,保卫国防”^⑥,朱德的题词指明了建设强大炮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卫国防、捍卫国家主权。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提出,“尽快把炮兵建设成为一支全军统一的、强大的、正规化的战斗兵种”^⑦。在制定了建设一支强大炮兵长远目标的同时,中央军委也制定了“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阶段计划^⑧。在此时期,炮兵司令部还根据不同的需求,及时调整建设对象,如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炮兵建设的重点为优先发展地面炮兵,在美军对朝鲜北部发起绞杀战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转向优先发展高射炮兵。中央军委和炮兵司令部制定发展强大炮兵的目标,犹如灯塔,为人民炮兵部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央军委确定在步兵的基础上创建人民炮兵部队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转变,“要有飞机、军舰、大炮、坦克、工兵、骑兵、伞兵和各式各样的兵种”,这样才能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军队^⑨。1950年4月,毛泽东提出,现在军队五六百万,主要为步兵,以后“要加强空军、海军、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减少陆军”^⑩。同年5月,朱德在中央军委参谋长会议上指出,“空军、海军、坦克兵、工兵、炮兵如何配备,哪个该多少?也须要研究”,他认为苏联“各种武器的配置,各军兵种的数目等,都很恰当”,要学习苏联的军兵种的配置^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真正有长期斗争历史传统的,“只有步兵”,要建设新兵种,“就一定要靠步兵作基础”,在步兵基础上建设各军、兵种^⑫。建国初期的几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步兵向海军、空军、炮兵等部队调入了大量的官兵,支援新军种、兵种建设,“在强大的陆军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崭新的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和各个特种部队”^⑬,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次大的历史性的转变”^⑭。

①《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批准党委名单》(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图片》,第231页。

②孔从洲《孔从洲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③《为炮兵学校题词》(1951年4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页。

④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编《朱德大辞典》,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

⑤《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1951年1月),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页。

⑥⑪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7页,第1410页。

⑦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371页。

⑧《共和国日记》编委会编《共和国日记(1950)》,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3页。

⑨《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1950年7月1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745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⑪《精简整编 提高部队战斗力》(1950年5月16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731—732页。

⑫《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1951年1月),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82页。

⑬《朱德总司令在“八一”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年8月2日。

(二) 炮兵部队建制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缴获中培养了自己的炮兵”^①。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有4个师、70多个团、3所学校和大量分队,有各种火炮2万多门”^②,但火炮口径小、射程短、种类杂,远不能担负起捍卫国家主权的重任,因此,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战斗力的炮兵部队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军委炮兵司令部组建后,朱德约见了陈锡联时指出,“当务之急是要抓紧训练干部,订购武器装备,组建新的部队”^③。

军委炮兵司令部组建2个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开赴了朝鲜战场。志愿军炮兵与美军炮兵相比,处于绝对劣势,为壮大志愿军炮兵力量,中央军委决定迅速地扩建炮兵部队。1950年10月,志愿军炮兵只有3个师建制,根据军委炮兵司令部的要求,中央军委从各军区“抽调8个步兵师,改装为炮兵”^④。为了使这批步兵掌握炮兵技术,“先后建立了8个训练基地”,军委炮兵司令部制定“紧张的、短期突击的战时训练方法”,使其迅速完成对新装备的掌握与使用,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炮兵官兵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改建与换装的任务^⑤。在苏联的火炮装备援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和扩编,到1953年上半年,人民炮兵“兵力共计30余万人,为1950年年初的3倍多”^⑥。朝鲜战争结束后,人民炮兵部队从大规模扩军转向了正规化训练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备主要源于战场缴获,种类型号复杂,且多数为骡马拖拽的小口径、近射程火炮,已不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建国后,炮兵装备急需更新。其一,从苏联引进火炮。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武器装备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朝鲜战争期间,自苏联引进“火炮数千门”,即有大口径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也有对空防御的高射炮,依靠这批装备,“有步骤地装备了82个炮兵团又177个炮兵营”,炮兵部队的“苏式火炮就达70%以上”,基本完成了由杂牌向苏式装备的转变^⑦。其二,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美军大炮。美军“怕切断后路”,一旦被断退路,“便举手投降”,或“装备一丢,开着汽车就跑”^⑧。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了敌人的大炮,改换了自己的装备”,缴获的炮弹“给我军解决了弹药缺少困难”^⑨。但美军撤退前,一般会将大部分装备毁掉,“缴获只是小部”^⑩。其三,仿制生产火炮。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基础薄弱,兵器工业只能生产一些小口径迫击炮。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按苏联图纸与技术资料仿制了53式82毫米迫击炮、55式120毫米迫击炮与56式160毫米迫击炮;按苏方图纸与技术资料仿制了55式57毫米反坦克炮;按苏联图纸与技术资料仿制了54式37毫米高射炮;按苏联图纸与技术资料仿制了54式122毫米榴弹炮与56式152毫米榴弹炮;按苏联图纸与技术资料仿制了54式76毫米加农炮和56式85毫米加农炮^⑪。1954年,因国营247厂试制成功76毫米加农炮,毛泽东致电嘉勉,“这对建立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增进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⑫。中国开创了自行仿制生产大口径火炮、对空高射炮的记录。各类火炮的相继仿制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拥有了第一代制式火炮。

①《我们永远站在国防最前线》,《人民日报》,1950年8月1日。

②《共和国日记》编委会编《共和国日记(1950)》,第393页。

③⑥⑦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372页,第377-378页,第378-379页。

④苏进《全军炮兵领导机构的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526页。

⑤《关于组建军委炮兵机关的回忆》,白竟凡编《高存信将军1军事工作文集》,第448-449页。

⑧《抗美援朝局势的发展前途》(195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⑨耿仲琳《吴瑞林史料》(上),2008年版,第1004页。

⑩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⑪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0页。

⑫《第二机械工业部国营二四七厂全体职工同志们》(1954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图片》,第238页。

二、朝鲜战争中的炮兵

1950年7月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尚未抵达北京)等作为军种、兵种负责人参会,会议决定“4个军3个炮兵师限7月底全部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①。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即按此执行”^②。10日,周恩来致电高岗,“我炮兵中许多炮需要修理”,“令东北之兵工厂根据战争需要准予提前修理”,并要求本月25日前“须修好”^③。9月5日,朱德指出,“炮兵和高射炮过去有底子,但是准备新的战争,必须有一部基准炮及弹,须准备”^④。炮兵部队按指示修理了火炮,并准备了一定数量的炮弹,为入朝作战做了前期准备。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4个步兵军及“炮兵一师、二师、八师”,“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⑤。10月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炮兵进入阵地运动时无空军和高射武器掩护”,请设法“速调一至两个高射炮团”,毛泽东回电,拟于14日自上海调一个高射炮团到朝鲜前线^⑥,14日,毛泽东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高射炮团“即开东北”。^⑦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线兵力为4个步兵军和3个炮兵师,总计“二十五万人”^⑧。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入朝,掀起了抗美援朝的序幕。中美双方都十分重视炮兵,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炮战”,对炮兵寄予了厚望^⑨。中国也极其重视炮兵的使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主力开往朝鲜,但志愿军入朝之初,由于人民炮兵建设起步晚,在装备质量与数量方面均远不如美军炮兵,当时美国一个军“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⑩。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设炮兵司令部,万毅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委、匡裕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12月,炮兵司令部回国整休,炮司领导分赴各训练基地,指导组训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8个师的训练工作顺利完成,受训官兵掌握了基本的炮兵技术,达到了“走得动,摆得开,打得响”的要求,各部自1951年2月起陆续入朝作战。此时原炮兵司令部改称“炮兵指挥所”,匡裕民任主任,同年11月,志愿军领导机关精简整编,“炮指改称炮兵主任办公室”,匡裕民任主任。1953年4月,炮兵主任办公室扩建成炮兵指挥所,高存信任司令员。志愿军炮兵指挥机构作为志愿军炮兵最高指挥机关,“虽曾几次易名,但其职责基本未变”,志愿军炮兵指挥机关(简称志愿军炮指)“在志愿军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与其他业务部门相配合,负责炮兵部队作战行动的组织与指挥”^⑪。

第一阶段,自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历经五次战役,将美军打退到三八线以南。朝鲜战争初期,美军拥有“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而志愿军“只有少数的炮兵”^⑫。志愿军炮兵

①《共和国日记》编委会编《共和国日记(1950)》,第35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61页。

③《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东北边防》(1950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32页。

④《对美帝侵朝战争的对策》(1950年9月5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755页。

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09页。

⑥《同意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待机歼敌》(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14—115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12页。

⑧《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50年10月14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⑨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第125页。

⑩《关于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1950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⑪贾克《志愿军“炮指”工作片断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540—541页。

⑫《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1951年8月1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417页。

的火炮多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部队中缴获的,炮老、型号杂、射程近和威力小,与美军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志愿军炮兵部队克服了装备差等困难,“在半年多的作战中,有力地支援着志愿军的步兵,予美国侵略军以痛击。炮兵们以自己的勇敢和技术,战胜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炮兵”,在各次战役中,志愿军炮兵压制了“占优势的敌人的炮兵”,为步兵开辟冲锋道路,“配合步兵大量地杀伤了敌人”。据被俘美军官兵讲,“你们的炮打得准!我们的炮虽然很多,可是没有办法制压你们大炮的发射,这是我们经常感到苦恼的事”,“你们打的是什么炮呀?又准又厉害,我们跟在坦克后面也不敢抬头”^①。

志愿军炮兵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了以劣势武器战胜优良装备的敌人的一整套本领”^②。其一,做好炮兵阵地的隐蔽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装备损失。志愿军炮兵有意识做“伪工事”,吸引敌人火力,消耗敌之炮弹,同时积极“构筑隐蔽工事”,不使之“暴露目标”,而碉堡式阵地既“费时又费事,目标暴露,易被敌人轰毁,是不适用的”^③,当时中国工业落后,火炮来之不易,补充困难,因此采取隐蔽工事是正确的抉择。其二,充分利用地形、天气等有利条件,对敌实施打击。彭德怀要求志愿军炮兵“充分利用夜间,实行大胆的迂回包围、穿插作战”,使得“敌人离开了飞机大炮,攻不能攻,守不能守”^④。其三,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敌炮兵实施突袭。志愿军炮兵“以精干部队突破敌阵地,抢夺敌炮兵,使敌失却支援”^⑤。其四,炮火的合理使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炮兵团对支援我军各师的作战,每次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20迫击炮有几种炮弹,“穿甲弹、爆破弹、燃烧弹、烟幕弹,用起来机动灵活”,在战斗中,“把敌人的坦克放到五六百公尺以内打,先用穿甲弹打,再用爆破弹去杀伤他的步兵,然后再用燃烧弹去烧他,使他的坦克和驾驶员,都变成灰烬”^⑥。

经过五次战役的洗礼,志愿军炮兵受到了全面的锻炼,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51年6月,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五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了朝鲜北部的土地,志愿军取得了同美军作战的经验。到1951年7月,志愿军预备炮兵“已有10个榴弹炮兵团、3个防坦克炮兵团、3个火箭炮兵团、4个高射炮兵师另1个团”。为了更好地总结五次战役以来炮兵行军、作战经验和教训,同年7月,志愿军炮兵指挥所主任匡裕民在朝鲜主持召开了炮兵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炮兵师、团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志愿军司令部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指示,匡裕民强调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明确了集中火力、阵地纵深配置等原则,要求各部队抓紧利用战役间隙进行整训,特别是加强步炮协同训练,以准备迎接更复杂艰巨的战斗任务”^⑦。

第二阶段,自1951年7月,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转入积极的防御作战。1951年夏秋之际,美军发动夏秋季攻势,志愿军炮兵“在配合步兵作战中连续以猛烈炮火痛击美、李进犯军”^⑧,在粉碎美军的夏秋季反攻中,“志愿军炮兵部队的炮兵,发挥了强大的威力”^⑨。彭德怀指出,该时期“我们目前在现代化武器方面还有许多弱点,在这方面敌人暂时还占有优势”^⑩。但总体上,此时期

①《英雄的志愿军炮兵》,《人民日报》,1951年6月7日。

②⑩《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1951年8月1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418页,第420页。

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50年10月14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25页。

④《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的基本总结及第二步作战方针》(1950年11月13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37页。

⑤《我军能够战胜装备优良的美国军队》(1950年12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4页。

⑥耿仲琳《吴瑞林史料》(上),第1001页。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7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⑧《朝鲜前线我炮兵部队配合步兵痛歼进犯敌》,《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5日。

⑨《马良山阻击战中神勇的炮兵》,《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4日。

的志愿军炮兵已在逐渐地壮大,壮大的志愿军炮兵部队日益成为反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战斗力量,志愿军击退了敌军频繁的小股窜犯,并不断地以攻坚、袭击、反击和狙击等各种灵活的战术手段消灭敌军有生力量。

美军地面部队发动夏秋季攻势的同时,“以其作战飞机的80%,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的几乎全部,发动‘绞杀战’,企图彻底破坏朝鲜北部的交通运输线,瘫痪我军后方,窒息我前方作战力量”。面对这一新的战场形势,彭德怀指示志愿军炮指组织在朝高射炮兵参加反“绞杀战”,志愿军炮指紧急调用1个高炮团和15个高炮营,并制定了“全线掩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战术。9月,美军飞机开始集中轰炸新安州、价川和西浦三角地带的铁路枢纽,企图炸毁一个关键点,而达到瘫痪整个朝鲜北部铁路系统的目的。志愿军炮指作出进一步加强铁路及江桥方面防空力量的决定,陆续抽调高射炮兵部队参与反绞杀战,增加到了14个高炮团又23个高炮营,采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广泛游动作战的方针,将2/3兵力配置于三角地带,同年12月在安州成立铁道高炮指挥所,吴昌炽任司令员,统一指挥掩护铁路的高炮部队^①。在反“绞杀战”中,志愿军“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264架,击伤1070架”^②。在志愿军高射炮兵、工兵和运输部队的共同努力下,“抵抗了敌人空军的破坏,修补了铁路公路,保证供应不绝”^③,大量的战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了强大的炮兵,也有高射武器”,敌人的飞机也不敢像“以前那样疯狂了”^④。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开始建立起相当强大的人民炮兵和人民空军”,当将其使用于朝鲜战场,“我们的战斗力就会显著地加强”^⑤。中央军委和炮兵司令部将人民炮兵主力陆续调往朝鲜战场,志愿军炮兵已有相当大的基础。在第一个阶段,“志愿军的炮兵部队使用的是数量既少、质量又差的炮。他们就是以这样劣势的装备,配合着步兵大量地消灭了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但是现在,即使一年前曾经到过朝鲜战场的人,看到我们强大的炮兵也会感到惊喜的。我们的炮兵已经大大增加了,而且装备了新式的现代化的大炮”,炮手历经实战的考验,火炮技术得到了快速的提升,“有了这样优良的大炮和优秀的炮兵,再加上其他胜利因素,这就使得朝鲜战场的形势大大改观了”^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空军、炮兵逐渐加强,敌人在谈判中对此不能不有顾虑”^⑦。

第三阶段,朝鲜战争进入停战签约前的以打促谈阶段。1952年10月,美军以战俘问题为理由,蓄意破坏谈判,“片面宣告休会,中断了停战谈判”^⑧。同月,美军集中大量的大炮、坦克和飞机,在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发起了攻击。战斗发生初期,上甘岭地区的志愿军炮兵的数量、火力不及美军,“敌我的火炮比例为5.5:1”,由于炮火不足,步兵在抵抗美军进攻和坚守阵地中,遇到了困难,但在志愿军炮指的统一协调下,适时加强了炮兵兵力,“敌我火炮比例为1.6:1”^⑨。志愿军炮兵积极“建筑坚固阵地”,严密“对敌侦察”,做到了“发现敌情快,组织指挥战斗快,火力反应快,射击准确、猛烈”^⑩,并采取集中使用和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了以少制多的胜利。陈锡联指出,在上甘岭战役中,炮兵协同步兵“毙伤敌2.5

^{①⑨} 贾克《志愿军“炮指”工作的片断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543页,第544-545页。

^② 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391页。

^③ 《朝鲜战争形势与中国军事订货》(195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309页。

^④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5日,第3版。

^⑤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1951年8月1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420页。

^⑥ 《祖国人民捐献的大炮在临津江前线》,《人民日报》,1952年9月30日。

^⑦ 《目前的作战方针与第六次战役的备而不战》(195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18-219页。

^⑧ 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1953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

^⑩ 万海峰《坚守上甘岭》,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607-608页。

万余人”，“其中被我炮火毙伤者达一半以上”^①。美军“每天打的炮弹多时到过三十万发”，但阵地仍在志愿军的控制之下^②。毛泽东对此战评价，“过去3个月中，我已消耗炮弹240余万发”，志愿军能够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为制胜要素”^③。

随着志愿军炮兵装备的不断补充，敌我炮兵装备差距逐渐减少，虽然志愿军在火炮的口径、火力方面与美军依旧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军轻迫击炮和火箭筒多”，“敌军则榴弹炮、战车炮多过我军”，但敌我火炮数量基本持平，1952年12月，我军火炮13000门，敌军火炮14000门^④。这一数量的变化与志愿军炮兵入朝之初已有天壤之别。志愿军炮兵轰击着美军的“坦克群和炮兵阵地”，不准它们“自由行动”，不准它们“发言”，志愿军官兵认为，“都说美国鬼子靠大炮吃饭，我看它这饭碗是不牢固了”^⑤。该时期，志愿军“已开始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空军，因而进一步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敌人已日益对我军的炮火和防空力量感到畏惧”^⑥。1953年3月，周恩来就战俘问题提出两步走办法，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该办法为美方接受，中断的停战谈判得以恢复。

1953年6月，正值停战协定准备签字前夕，李承晚集团公然“扣留了2.7万余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叫嚣“单独干”和“北进”。7月中旬，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破坏停战谈判的行径，志愿军主动发起了金城战役，该战役是志愿军使用炮兵“最多的一次进攻战役”，火炮“已达1104门，平均每公里地段上有44门火炮”，就火炮而言，“我军稍优于敌，而在主要突击地段上则占有绝对优势”，重点地段达到每公里百门以上的密度。7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100余火炮的支援下向敌发起多路攻击，在攻击前，各炮兵群按原定计划向敌方阵地开始了持续炮火打击，敌方坚固工事大部被摧毁。14日，志愿军拉平了金城以南战线，此后转入控制和巩固占领线，16日，美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向志愿军反扑。在金城作战中，志愿军炮兵部队坚持“阵地分散、火力集中并能互相支援的原则”，实施了“交互前推”战术，“保证我炮火支援步兵作战不致中断”^⑦。志愿军炮兵“在巩固阵地打敌反扑作战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既支援了步兵，又以火力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该役“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造成了签约前的“有利态势”^⑧。美军迫于战场形势，急迫与中方达成签约，并于7月27日与中国、朝鲜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

志愿军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任务繁重，既要支援步兵作战，还要同美军空军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装备与美军存在巨大差距，但“我们从敌人方面学会了不少东西，现在我们已经锻炼出来了”，美军使用了“最新式的飞机、大炮、坦克乃至细菌武器”，志愿军“懂得了怎样对付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们就学不会这些经验，就不会把我们的国防力量像现在这样加强起来”，朝鲜战争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⑨。毛泽东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使志愿军各军兵种“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⑩。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⑪。

①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391页。

②③《敌人的失败与我们的胜利》（195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94页，第297页。

④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⑤《朝鲜战争形势与中国军事订货》（195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310页。

⑥“不准它们自由行动”——记日益强大的志愿军炮兵，《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6日。

⑦《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9日，第4版。

⑧《炮兵作战补充指示》（1953年7月17日），张震《张震军事文选》（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页。

⑨高存信《金城战役中的炮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615页。

⑩《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5页。

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81页。

三、炮兵人才的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炮兵的成长主要靠从部队中土生土长和战争实践的锻炼,难得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培养和训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了新的装备,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它掌握起来”,“但是现在我们干部战士的知识技术不够用,这便成为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努力学习,学会新知识新技术,使用新武器”^①。炮兵“是个战斗兵种,又是个技术兵种”,培养一批掌握火炮技术的官兵,“是提高炮兵部队整体素质的决定性因素”^②。尤其是在炮兵快速扩军阶段,炮兵官兵的培养更为重要。1951年7月30日,朱德在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四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传统步兵向陆、海、空军种和炮兵、装甲兵等诸兵种转型,为了“完成这个转变,我们的部队必须积极地学习和提高技术”^③。建国初期的几年,通过学校培养和军事训练,炮兵官兵掌握了基本的火炮技术。

(一) 炮兵学校建制与学校教育

炮兵军校就是炮兵部队建设的“重工业”和“老母鸡”^④,这一形象的比喻恰当地反映出炮校建设的重要性。朱德亲自为炮兵学校开学典礼题词,“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掌握现代化的炮兵技术”^⑤。炮兵是一个技术比较复杂的兵种,炮兵的武器装备不仅有各种性能不同的火炮,而且还有各种对空与对地面目标的雷达、指挥仪、光学侦察、测地仪器、有线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以及多种型号的牵引、运输车辆,因此需要通过系统的教育,使得炮兵官兵掌握好各项先进的炮术及相关技术,炮校教育是一项重要且长期的任务。

炮兵部队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经过正规学校训练的干部”^⑥,为适应炮兵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多所炮校。1950年8月,朱瑞炮兵学校改称中央军委炮兵学校,毛泽东题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校名,1952年7月该校改称高级炮兵学校,主要培养中、高级炮兵人才^⑦。1950—1951年,人民炮兵相继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炮兵学校。1952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所军械学校为基础,成立高级炮兵技术学校、第一炮兵技术学校和第三炮兵技术学校^⑧。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内设炮兵系和炮兵工程系,也为炮兵部队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其任务为“训练熟悉与指挥现代化各技术兵种”^⑨。根据军兵种迅速发展的情况,刘伯承积极推动建设炮兵系,1952年炮兵系正式成立,内设“地炮射击、地炮兵器、侦察测地、炮兵通信和牵引车等教授会”,以张书祥为系主任。1954年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司令员高存信调任系主任,同时炮兵系增设“高炮战术、高炮射击和高炮雷达”等教授会,教员达到100余人,到1955年,学员达到400多人^⑩。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为炮兵部队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化炮兵技术和战术的师、团高级干部,对炮兵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1953年3月18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副总参

①《增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1950年12月15日),陈毅著《陈毅军事文选》,第528页。

②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383页。

③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第1410页。

④夏琦《坚持正规办校 把学校建成模范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621页。

⑤《为炮兵第五期开学典礼题词》(1951年4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朱德手迹选》,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⑥孔从洲《孔从洲回忆录》,第458页。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图片》,第239页。

⑧《增建炮兵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图片》,第243页。

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任务》(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77页。

⑩孙维群《刘伯承院长对炮系的关怀》,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676—677页。

谋长粟裕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各特种部队发展甚快”,“唯在技术上还远落后于部队的发展和不能够满足部队的要求”,为此,即“着手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借以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学校辖炮兵工程系等5个系,毛泽东批示“同意”^①。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同年9月1日,在哈尔滨成立了军事工程学院,内设炮兵工程系,主要任务是培养炮兵军事工程技术干部。

人民炮兵部队初建时期,较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师、团级指挥人才。鉴于此,中央军委决定以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为基础建立炮兵学院。1956年5月,军委炮兵司令部成立了炮兵学院筹备委员会,苏进为主任,高存信、刘春为副主任,由军委炮兵机关和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协同筹备事宜。朱德亲自为炮兵学院选定院址,他认为,“宣化距北京较近,靠近领导机关,便于指导学院的工作”^②。在筹备过程中,刘伯承为建立炮兵学院解决了教员、教材和器材等问题,6月,他在军事学院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明年(1957年)暑假前完成”,加速了炮兵系扩建炮兵学院的步伐^③。1957年7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在河北宣化宣告成立,陈锡联兼任院长,这是当时人民炮兵的最高学府。

教员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员的质量,关系到炮兵学校建设的成效,教员的培养与水平提高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在。朱德要求教员在“教学实施中很好研究创造新的方法,安心为学校服务”^④。为了弥补教员数量的不足和提高教员的水平,各炮校通过推行各种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其一,补充教员数量。炮兵学校教员最初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炮兵人员、国民党投降的炮兵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这三个部分组成,但远远不能满足炮校建设的需要,因此炮校决定“从毕业学员中选拨文化水平较高、年轻、优秀的干部留校任教员,充实教学力量”,通过自己培育方式,弥补了教员的不足。其二,以培训办法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为提高教员的水平,炮校决定通过“搞教学法集训和定期总结教学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提高教员的教學能力”。其三,在物质等方面保障教员生活,使其专心教学工作。炮校在十分艰苦的情况,通过种种办法,“从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其专心于教学工作”^⑤。其四,通过学习苏联教学经验提高教员水平。彭德怀指出,各军事院校“应继续研究和学习苏联的先进军事经验和教学方法,注意逐步提高教员质量”^⑥。通过以上措施,炮校教员短缺和教学水平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在炮校建设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军情的教学方法。第一,以教学为中心。在教学开展过程中,各炮校提出“一切工作都围绕教学、保证教学,各行各业都为教学服务,保证教学质量”^⑦。第二,正规化教学。军事学校“应有正规的统一的计划和制度”,学校必须按军委批准的规章制度“来办”^⑧。刘伯承形象地以“一部大机器”为喻,军队生活秩序就如同“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之间有规律和协同工作一样^⑨。第三,学校教育要适合军队。朱德指出,“要注意学用一致,要适合军队建设的需要,不要军队搞一套,学校又搞一套”^⑩。为了使学校的训练内容“符合部队建设的需要”,炮兵

①《同意建立军事工程学院》(1952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第21页。

②丁本淳《朱德同志关怀炮兵建设》,何静修等编辑《回忆朱德》编辑组编《回忆朱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③孙维群《刘伯承院长对炮系的关怀》,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677页。

④《办好军校是建设军队的第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9月19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803页。

⑤孔从洲《孔从洲回忆录》,第459页。

⑥彭德怀《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195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42页。

⑦夏琦《坚持正规办校 把学校建成模范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622页。

⑧《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51年9月24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810页。

⑨《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1951年1月),《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85页。

⑩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第1414页。

学校“每期的训练大纲都尽可能地先征求部队意见”,然后根据部队意见修订后实施^①。第四,提倡专研军事学术。“对于海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的技术,如现在不注意好好学习,将来怎样指挥呢”,“有了现代装备,没有善于运用技术的干部,便是死的東西”,因此要求部队“好好学习技术”^②。通过以上教学方法的实施,炮校学员掌握了炮兵技术,炮校建设取得明显的成效。

(二) 部队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迎来了快速的扩军阶段,新增炮兵部队官兵多源自步兵,他们没有接触过火炮,完全不懂炮兵技术。除了通过学校系统教育,使得一部分炮兵官兵学习炮兵的技术和战术,更多的是要通过部队训练,使官兵掌握基本的炮兵技术。现代化军队“首先是在于提高部队的质量”,而提高部队质量又“必须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正规训练”^③。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部队军事训练工作作为全军的工作中心”^④。

炮兵部队从短期集训向正规化与现代化训练过渡。炮兵司令部组建2个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开赴了朝鲜战场。在朝鲜战争初期,为快速增加志愿军炮兵部队起见,采取了突击训练方案。1950年11月,中央军委调8个步兵师用以改建炮兵部队,“为使他们迅速掌握炮兵技术”,组建了8个训练基地,采取了“紧张的、短期突击的、战时的训练方法”进行改装训练,“只用两三个月就完成了改装,训练任务”^⑤。各部训练结束后,即开赴抗美援朝前线战场。自1952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有步骤地开展正规化的训练。1951年9月24日,朱德在各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及各军区参谋长、军训处长集训会议上指出,“一九五二年的训练计划,主要目的是使军队走向现代化、正规化”,从步兵到特种兵“都在统一计划下进行训练”,“游击主义、分散主义等,均应纠正,不能保留”^⑥。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掀起了正规化训练的热潮。1953年12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比较简单,现在已逐渐在改变;过去我们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依靠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⑦。贯彻条例是正规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建设一支正规化炮兵部队,就必须认真贯彻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等,人民炮兵部队通过一系列的正规化训练,提升了炮兵的技术和作战能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必须强调陆海空及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诸军兵种协同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各兵种“在战术上的协同动作,多半是依靠对技术的掌握来实施的”,如步炮协同是依托于“炮兵的准确射击来实现的”,这就要求各兵种须加强自身的训练,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同作战^⑧。

炮兵部队坚持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办法。在炮兵建设中,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了政治工作,提高官兵的政治思想。在强调政治教育的同时,也明确了政治教育要与技术训练配合。朱德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工作部门”应保证技术“训练”^⑨。彭德怀也指出,政治工作要“给业务和技术的提高以有力的保证,这样才能发挥其对军事建设的重大作用”^⑩。基于此,中央军委“建立了特种兵的政治工作,保证了特种兵的建设和技术训练任务的完成”^⑪。在新技术训练中,炮兵官兵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看不起新知识新技术”,认为“过去没有新知识新技术也能打仗,也能胜利,便不愿学习

①孔从洲《孔从洲回忆录》,第466页。

②《倡导部队钻研军事学术风气》(1954年4月25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828页。

③⑦⑩彭德怀《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195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35页,第542页,第545页。

④彭德怀《关于实行三大制度和军事训练问题》(1954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619页。

⑤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377页。

⑥⑨《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51年9月24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806、808页,第810页。

⑧《在辽东军事演习干部会上的讲话》(1955年11月),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530、532页。

⑪萧华《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1954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65页。

了”；另一种是认为炮兵技术复杂，然自己又“没文化，又不懂什么数学、物理、化学，怕麻烦”^①。经过不断的政治教育，炮军官兵认识到了学习技术的重要性，这就是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结合的典型案例。

总之，通过各炮兵学校的培养及部队训练，短短几年时间，“全军炮兵共培训出数万名干部和数万名技术骨干，基本满足了炮兵大规模发展的需要”^②。

四、苏联援助与自主发展

苏联炮兵“是强大无敌的”，苏联炮兵的强大，是以其“强大工业为基础的”^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炮兵装备进口只能寻求苏联。鉴于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差甚大，1951年5月，中国派出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其任务在于向苏联“购买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④。在制定向苏联订购火炮的计划中，朱德向炮兵副司令员苏进指出，“数量要多些，口径和射程要大，威力越大越好”^⑤。在装备质量上，斯大林提出了积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每个师的装备不够强，“提议每师须配备坦克，增加炮火”，毛泽东表示“这是完全正确的”，并指示徐向前照斯大林的意见“具体商谈”^⑥。经过谈判，苏联同意这六十个师的装备援助到“1954年底完成”^⑦。从1950年到1953年7月，中方向苏联“订购接收了苏式火炮数千门”及相应的配套装备^⑧。到1955年底，中国共接收苏联1.1万多门火炮^⑨。苏联在援助中国军事装备上，“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⑩。

在引进苏联火炮装备的同时，中国也注意到了自主发展的重要性。1950年5月，朱德在中央军委参谋长会议上指出，“要尽量发展生产，把家务搞得更大”，“大炮、飞机都能自己造”^⑪。1953年1月，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等出席，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搞兵工生产，没有大炮，靠人海战术不行”^⑫。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指出，飞机、大炮等现代化装备“不是单靠国外订货所能解决的，必须建设我们国家自己的工业”^⑬，没有属于自己的重工业，就不可能为装备的现代化提供后备支撑。根据我国国情、军情，中国走了一条由依托进口到仿制苏式火炮，再到独立生产火炮的道路，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道路，符合国情的道路。

建国初期，在炮兵的苏联顾问“前前后后大概有几十人”，“少部分在机关，大部分在学校，部队没有”^⑭。苏联顾问分首席顾问和顾问两级，苏军炮兵少将尼戈尔斯基是第一任炮兵首席顾问，1951年下半年奉调回国，他“对我军炮兵建设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尤其对炮兵干部的培训、炮兵领导机关的组建和订购火炮工作，都给予很大帮助”^⑮。此后苏联又派来两名上校担任军事顾问，一个负责地面炮兵，一个负责高射炮兵，此时没有首席顾问。1953年，符拉基米罗夫中将担任炮兵首席顾问，在华长达3年多。

①《增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1950年12月15日），陈毅著《陈毅军事文选》，第528-529页。

②③④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385页，第379页，第400页。

⑤《无敌的苏联炮兵》，《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1日。

⑥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600页。

⑦⑧苏进《全军炮兵领导机构的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526页，第525页。

⑨《请苏联提供六十个师装备并在六个月内运至中国》（1951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第504页。

⑩《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1950年10月7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05页。

⑪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1956年9月18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557页。

⑬《精简整编 提高部队战斗力》（1950年5月16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733页。

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4页。

⑮《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1954年1月26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498页。

为了便于与苏联沟通,“炮兵机关专门设了一个翻译组”,业务性的工作,“由炮兵各有关部门提出方案或草案,经翻译组译成俄文,交专家征求意见;重要的事情,由炮兵领导与苏联专家直接商谈”^①。各炮校也配有翻译人员,以便与苏联顾问沟通。苏联顾问为人民炮兵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一,帮助建设炮兵领导机构和拟定部队编制。其二,协助向苏联订购武器,指导部队训练。顾问对炮兵训练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亲自指导官兵训练,要求严格,“战时仗怎么打,平时部队就怎么训”。其三,协助炮校建设。苏联顾问“协助制定教学组织细则、教学法训练规定”等规章制度,解答了炮校提出的“有关学校建设的各种问题”,并为炮校培养了优秀的教员^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炮兵向苏联学习经历了从全面学到辩证学。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定“以伟大的苏联军队为榜样”^③,号召全面学习苏联。中央军委提出“把苏军建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完全学到手的要求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通过学习苏联技术和经验,少走了“弯路”,实现炮兵部队的快速发展^④。因为炮兵部队执行全面学苏联的政策,故出现了“照搬苏军的模式”情况,“形式主义的东西也不少”。鉴于此,陈锡联等提出,“一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前提下,再“借鉴和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⑤。人民炮兵逐渐由全面学向辩证学转变,既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不盲目照搬,通过不断摸索,逐渐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炮兵特色的发展道路。

结 语

通过几年的建设,人民空军、海军有了,陆军的“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⑥。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炮兵圆满地完成了抗美援朝的伟大任务,到抗美援朝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特种兵部队已具有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这在我国建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它为我们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初步奠定了基础”^⑦。到1956年,炮兵等各兵种都“有了很大的加强”,“已经达到我国空前未有的规模”^⑧。

建国初期,人民炮兵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以毛泽东为首第一代领导人为炮兵的发展确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人民炮兵部队发展首先应归功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⑨。其二,全国人民对人民炮兵的支持。1951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⑩,各行各业都积极筹款,用于购买飞机和大炮。志愿军炮兵部队“用祖国人民送来的大炮,消灭了大量敌人,这功劳应该属于祖国人民”^⑪。其三,步兵对炮兵的支援建设。人民炮兵创办之初,中央军委将大量步兵调入炮兵,支援炮兵建设,可以说步兵孕育了炮兵。其四,炮兵领导机关和全体官兵的努力。在人民炮兵建设的过程中,“军委炮兵首长对炮兵部队和院校建设抓得很紧”^⑫,同时炮兵官兵通过学校学习和部队训练,很快掌握了炮兵技术,推动了炮兵部队的发展。总之,1949—1956年的炮兵建设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王 戎]

①⑤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401页,第403页。

②巴芳辰《忆苏联炮兵顾问二三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炮兵回忆史料》,第627—629页。

③《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开幕词》(1953年12月7日),朱德《朱德军事文选》,第825页。

④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1956年9月18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566—567页,第556—55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81页。

⑦彭德怀《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195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25页。

⑨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第403页。

⑩《抗美援朝总会举行常委会》,《人民日报》,1951年6月2日。

⑪《祖国人民捐献的大炮在临津江前线》,《人民日报》,1952年9月30日。

⑫孔从洲《孔从洲回忆录》,第458页。